



红色戏曲文化研究

——以 1958—1959 年上海市曲艺会演为例

王亮¹, 沈悦²

(1.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2.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急需加强政治宣传,以期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社会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以评弹为代表的上海曲艺界表现突出。为了展现既有成绩,选拔优秀节目参加全国曲艺会演,上海市政府先后于 1958 年、1959 年举办两届曲艺会演。1958 年曲艺会演展示了文艺政治化特征,但因经费上不充足,组织上不健全,结果参演作品难以完全符合政治要求。1959 年曲艺会演,在经济状况未改观的情况下,借助集体组织的力量,完成了首届曲艺会演暂未达到的政治目标,为继续突出政治性提供组织保障,进一步促进组织化进程。

关键词: 曲艺会演;政治;艺术;评弹

中图分类号: K27;G1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6-0278-06

Research on the Red Opera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Quyí Festival between 1958 and 1959

WANG Liang¹, SHEN Yue²

(1.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2.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new government starved for enhancing political propaganda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in order to unify the people's thinking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Represented by Pingtan, Shanghai folk art circle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this process. Aiming at demonstrating existing achievements and selecting excellent shows to attend the national Quyí festival,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osted the Shanghai Quyí Festival in 1958 and 1959 respectively. Although Quyí Festival in 1958 exhibited political features of culture and art, the works failed to meet political requirements due to the lack of outlay and improper organization. Under similar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the 1959 Festival attained the political goals which were not achieved in 1958 with the help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it helped continue to highlight political features and further promote systematization process.

Key words: Quyí festival; politics; art; Pingtan

关于新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最具代表性的是傅瑾的《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该著作从宏观层面论述新中国半个世纪的戏曲发展情况。以此为基

础,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以评弹为切入点,以社会文化史为理论指导,从微观视角再拓新领域,《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便有开创之功。该著作记述评弹艺人成长的特殊经

收稿日期:2020-02-16 网络出版日期:2020-04-2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NDQN362YB);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7132169-Y);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1440033381902)

作者简介:王亮(1984—),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历,揭示江南社会变迁的时代特征。青年学者张盛满的《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以新旧时代鼎革之际为时间点,以评弹艺人为研究对象,以小见大地讲述时代变局的宏大图景。既有成果为后继学者深化研究奠定基础:一方面,宏观视角与微观切口相结合的理论架构,有助于勾勒戏曲发展的整体状况;另一方面,特殊时段与艺人命运相结合的观察视角,有助于以小见大地揭示时代特征,从而为新中国大众文艺研究引入新理论,拓展新领域。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曲艺会演中表现突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经济形势的好转,新政府需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对思想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期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由于戏曲艺术在上海种类繁多,占全国“最大的比重”,特别是甘余剧种、数千位艺人汇聚于此,传道其间^[1],于是,时事政治宣传普及工作借助戏曲艺术舞台呈现得以展开。戏曲艺术中,评弹艺人不同于角色固定的戏剧演员,在演出内容上可一人多角,在演出形式上可跳进跳出,再配合琵琶三弦、长衫旗袍的简便行囊,视觉吸引力大,市场竞争力强,成为新政府争取的对象和改造的重点。上海评弹团于1951年11月20日组建,是能与上海京剧团、上海杂技团并驾齐驱的国营剧团,其成功组建反映了在民间的受众之广和对宣传的作用之大。^[2]

上海评弹团组建后,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作为书目革新的伊始,塑造“中篇评弹”的演出模式,在内容上配合“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满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体现一种文艺政治化的趋势。^[3]此后《海上英雄》和《王孝和》等中篇作品先后问世,票房上佳。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兴起,政策收紧——要求说书应与时俱进,实现“文艺为时事政治服务”的更高目标。为此,该团适时调整策略,将演出与劳动相结合,将创作与辅导相结合,将新编作品的呈现形式确定为“短小精悍”,将时代新篇的表演内容圈定为现代生活,形成系列中短篇。由于曲艺竞赛是政治运动得以推广的重要动力,是戏改工作得以深入的最好形式^[4],因此,上海市先后于1958年、1959年举办两届曲艺会演,在评弹界组织化运动的助力下,促使文艺政治化趋势的深化。

一、渲染政治色彩:1958年曲艺会演

1958年春,上海市文化局及剧协为了检查曲艺

工作进展情况,衡量为工农兵服务程度,选拔优秀作品晋京展演,决定举办首届曲艺会演。会演工作委员会主任是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副主任是戏曲界姚时晓、刘宗诒,工作委员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和副团长李庆福等国营剧团领导,具体负责国营剧团艺人的提名工作。整风工作组承担评弹单干艺人的推荐工作,各辖区各科室提名其他曲种,以保证节目内容兼具人民性与艺术性,并要求现实题材作品不得少于总数的2/3。^[5]文化局领导担任主任委员的做法,确保政治正确性以得到政府认可,提升活动影响力以推动宣传工作。参赛人员的选拔条件,有助于提升国营剧团的社会地位,压缩单干艺人的生存空间,有助于国营剧团规模持续扩大,组织化运动不断拓展。参赛作品的限制要求,有利于促进时事政治的渗透,推动新编作品的诞生,尽快实现现实题材节目占主流的目标。这一切是“反右”及整风运动后,政府对曲艺界有效管理的体现。

1958年的曲艺会演涉及评弹、沪书、苏北评话、滑稽故事等四个曲种,共97档节目,评弹独占87档,以仙乐书场和新华书场为固定鬻艺舞台,可见评弹担任会演主角。^[6]其中,现代题材的作品有52个,比传统作品多7个,占到演出作品总数的五成,但未达到赛前规定2/3的标准(即64~65个)。这一结果源于公开售票方式的采用,即每场抽出百张票根供内部观摩,其余在市场销售,做到收支平衡,争取节余上交。^[5]因为艺人自筹会演经费的现状,决定呈现内容的自主性,限制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再加上艺人数量极为庞大,降低集体组织的约束力,致使政策推行效果大打折扣。然而政府可借助工作委员会,评判参赛作品,推荐晋京节目,弥补经济控制的不足。6月底,曲艺会演参赛作品评比结果公布,见表1。

表1 1958年曲艺会演参赛作品评判结果

级别	现代题材/个	传统题材/个	小计/个	上海评弹团/个
优秀	11	7	18	14
较好	23	14	37	15
一般	17	22	39	0
不好	1	2	3	0

资料来源: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的报告[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8年,档案编号:B172-1-283.

在表1所示的1958年曲艺会演参赛作品中,优秀与较好级别的现代题材作品均占六成有余,已接近于2/3的比例。可见,尽管存在经费自筹的不足和集体组织的欠缺等问题,政府领导的工作委员会仍能在级别评定上突出现代题材优异成绩,满足相

关政策具体要求,减少传统作品获奖比率,实现文艺服务政治目标。质言之,政治挂帅,厚今薄古,现编题材着重反映当前斗争状况,传统作品也要浸染一定的人民性。^[7]不反映新状况的新编,不具备人民性的传统,难有佳绩。

上海评弹团成绩斐然,优秀级别作品 14 档,较好级别作品 15 档,可谓执上海曲艺界牛耳。获此佳绩,原因有四:政府直属国营剧团组织优势明显,依靠集体力量,短时突击完成整旧创新任务,作品质量均属上乘;“反右”运动在团内落实后,艺人统一个人思想,重视新编作品,反映建设成就;团内艺人原本就是名家响档,极具票房号召力;吴宗锡团长和李庆

福副团长均为工作委员会委员,评判优劣自有倾向,展示出的人际优势不可小觑。各种影响因素相互叠加,交错杂糅,展示给世人面前的,便是一张张奖状,一捧捧鲜花,一片片掌声,一项项铸就评弹团辉煌的傲人成绩。组织化的优势由此可见一斑。

首届曲艺会演是在响应中央文化部举行全国曲艺会演的号召过程中得以确定的,因此会演任务就包括选送优秀节目晋京演出。经过筛选而评出的 18 档优秀作品,需再优中选优,具体标准由文化局定夺,即政治性高于艺术性,首先应使现代题材广泛呈现崭新生活,传统题材增加现代精神,其次考虑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8]^[14] 四部曲艺会演选派进京作品脱颖而出,见表 2。

表 2 1958 年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选派进京作品概况

演出时间	艺人及作品	入选理由
6月10日	唐耿良《王崇伦》	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王崇伦破除迷信,敢于创造的故事。成功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结合,发挥艺术创造的革新精神,展示英雄人民的普遍心理。
6月10日	刘天韵、苏似荫《王魁负桂英·义责》	塑造了一个正义凛然,是非分明的王忠形象,批判了见利忘义的王魁劣迹。该书是非分明,具有时代精神。
6月11日	钱雁秋、严大君《曙光与五味斋》	讲述大跃进时上海民众争分夺秒、先进带后进的事迹。取材于现实生活,揭示了人物思想,符合着政策要求。
6月12日	陈卫伯《社会主义第一列飞快车》	讲述列车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保守思想、提高车速的故事。主题思想明确,艺术性高。艺人深入生活,接触面广,歌颂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员工及协作精神。

资料来源:毕采.这段评话说得好!——曲艺会演中的《王崇伦》[N].新民晚报,1958-6-11(2);钱雁秋.演出《曙光与五味斋》前后[N].新民晚报,1958-6-19(5);世远.听评话《第一列飞快车》[N].新民晚报,1958-6-19(5);曲艺会演圆满结束[N].新民晚报,1958-7-16(2)。

四部作品的入选理由是,都能展现时代新风貌,建设新成就,人民新精神,政治立场正确,艺术水准上佳。红旗评弹队优秀作品有两部,即《曙光与五味斋》《社会主义第一列飞快车》,创造性地描绘了上海市民的时代精神,诠释百姓跃进成绩,体现思想改造程度;上海评弹团优秀作品也有两部,即《王崇伦》《王魁负桂英》,均形成于 1956 年,但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颇受好评。然而国营剧团晋京节目只有两个,与私营公助的红旗评弹队并驾齐驱,却没有独占鳌头,略显遗憾。再加上刘天韵、唐耿良都是 20 世纪 40 年代便已红遍沪上的响档,在 50 年代末期仍能活跃于舞台。这一结果说明评弹团的既有辉煌仍是老一辈艺术家缔造的,青年演员卓越者乏善可陈,暴露了团内人才培养不足不精的弊端,同时,竞赛经费不足、集体组织缺失等现实问题致使政府管理能力有待提升,暂时无力抵消来自市场评判因素的影响力度。四部作品于 7 月 27 日公演于仙乐书场后,便踏上晋京之途。1958 年,大跃进运动爆发前夕,艺人卖座与否为代表的市场评判因素仍然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只是这股力量在次年被单

干艺人的组织化运动彻底击溃。

首届曲艺会演效果差强人意,源自于 1957 年的“反右”与整风致使艺人思想趋于统一,逐步接受政治性高于艺术性的创作要求^[9],但仍有提升空间:经济上,艺人自筹经费的现状导致参演作品暂难符合政策要求,出现政治立场错误和深入生活不足的弊端;组织上,国营剧团难以扭转评弹界整体表演现状,致使艺人个体存在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了进一步提升艺人演出水准,1959 年的曲艺会演只能在既有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依靠扩建组织提供保障。

二、依靠组织保障:1959 年曲艺会演

“大跃进”的初期,经济层面弊端已显,三年困难阶段,生活水平提升迟缓。上海受此影响而未能幸免。1959 年的曲艺会演面对一筹莫展的经济现状,只得依靠组织保障来响应政府号召,完成政治任务。1958 年红旗队和解放队同时组建,次年增加到红旗、解放、长征、先锋、星火等五支队伍,在接受思想教育,下乡锻炼之后,再扩充到十支,将整个上海评弹界纳入组织化体系。^[10]1959 年的曲艺会演就是在

评弹界的组织化进程中举行的。

为了检查首届曲艺会演结束之后上海戏曲界的改造成效,1959年3月,文化局开始规划第二届活动,不再组建工作委员会而只成立内部工作组。这一做法是缘于政府已有红旗队和解放队,吸纳单干艺人加入,并鉴于组织化运动形势已现,将评判推选艺人及其作品的具体事务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即由工作组负责,而只掌握审核权力。工作组成员包括市文化局领导、中国剧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评弹团团长及各区县文化局科室主任等主要负责人。在评弹界,评弹工作者协会主要负责红旗队、解放队等集体所有制组织和单干艺人的节目选拔工作,上海评弹团领导负责团内艺人的节目选拔工作,统一提交工作组,再由政府审核。在45个推荐节目中,包括28个现代题材的节目,已接近于总数2/3的要求。^[11]

第二届曲艺会演节目的呈现内容上,要求政治标准第一,兼具艺术性的表现,同时,已参演首届曲艺会演的节目,不得再参加第二届,以促使时事新书持续涌现。^{[12]14}全部节目分11场,评弹占6场,采用公演方式,其他曲种5场,内部观摩演出。^{[12]37}由此可见,评弹改造成效已经显露,在组织保障的前提下,已能进行公演,可谓执上海曲艺界牛耳,同时也出于

筹募演出经费、减轻财政压力的目的。1959年6月19日,包括评弹在内的十个曲种正式登台鬻艺。

第二届曲艺会演节目数量上,48个节目(后增加3个评弹作品)中,评弹占21个,数量最多,仍是会演主力,凭借唯一的公演资格,成为上海曲艺界杰出代表。21个节目中,加入组织的艺人贡献18个,充分展示集体的力量。再加上各级政府掌握节目推荐权和甄别筛选权,是否加入政府认可的集体组织直接决定艺人的参选节目能否脱颖而出,因此,会演结束后,评弹艺人纷纷积极加入集体组织。可以说,曲艺会演的成功举行对评弹界组织化运动的顺利完成大有裨益。作为唯一的国营剧团,上海评弹团贡献9个节目;中篇投入大,有2个,在11个场次中独占两场,可见评弹新形式备受推崇;3个开篇及小演唱,是该团重视弹唱的集中体现;剩余4个节目是3个弹词和1个评话,客观上说明评话不被重视而渐显颓势的现状。

作为上海曲艺界杰出代表,评弹贡献21个节目,其中18个是集体组织的努力,因此有必要对集体创作的节目深入阐释,以探求不同属性组织机构贡献作品的水准高低。这18个节目的简评情况见表3。

表3 1959年上海市第二届曲艺会演集体组织中评弹作品简评

作品名称	所属机构	社会舆论品鉴概况
《玉蜻蜓·厅堂夺子》	国营上海评弹团	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丑恶,赞扬贫苦人民的反抗精神。凭借传统作品的改造反映时代特色的印迹,艺术感染力强。
《孟师父》	国营上海评弹团	描绘钢铁工人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情,极具时代性。内容与形式属于上乘之作,成功将教育意义蕴含于艺术表达中。
《思凡》	国营上海评弹团	作为团内唯一的女性党员,朱慧珍在《思凡》表演的过程中,将“唱”的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展现榜样的力量。
《人民公社好》	国营上海评弹团	团长吴宗锡认为通过集体演唱方式来呈现,效果欠佳,是失败的,“小演唱”仅适用于农村的嘈杂紊乱而不符合城市清雅有序,强调评弹艺人不适合表演集体演唱。
《老地保》	国营上海评弹团	讲述老地保洪奎良侠肝义胆,舍己救人,不屈不挠地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感人故事。主角形象生动鲜明,彰显了人民群众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颇受观众好评。
《花木兰》	国营上海评弹团	作为“丽调”创造者,徐丽仙以传统演唱形式,杂以伴奏崭新风格,塑造花木兰替父从军、报效祖国的高贵品质。
《万古长青》	国营上海评弹团	尝试将国外斗争故事赋予中华民族感情,内容新颖独特,拓宽创作领域,启发艺人智慧,颇受舆论推崇。
《冲山之围》	国营上海评弹团	新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展现太湖游击队神出鬼没击败敌人,斗智斗勇得胜利的传奇故事。语言生动,逻辑严谨。
《江南春潮》	国营上海评弹团	新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讲述船厂工人不畏强敌,英勇保护工厂设施,迎接解放的革命事迹。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向秀丽》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与《人民公社好》相类似,也采用集体演唱的方式,表现向秀丽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但是现场表演效果欠佳。
《革命的一家·寻党》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讲述母子两代向往革命,不辞辛劳寻找党的感人事迹。人物思想感情刻画细腻,但是英雄形象塑造地不够丰满。

表3续

作品名称	所属机构	社会舆论品鉴概况
《野火春风斗古城》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讲述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在白色恐怖的氛围里,与敌人周旋斗争的英雄故事。严肃认真的表演风格值得赞扬,但英雄性格刻画得不够坚定,革命故事讲解得不够曲折。
《虞山脚下》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反映大跃进时期农民响应党的号召,任劳任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人物心理分析到位,外在性格刻画不足。
《长空怒鹰》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评话传统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表现人民空军勇于出击,勇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故事紧张有余,细节穿插不足。
《海瑞》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讲述海瑞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历史故事。塑造主角品质层面略显不足,且噱头主义仍有残余,受到不少批评。
《双珠凤·凉亭送别》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上海评弹团艺人刘天韵认为这个节目是失败的,因为没有突显杨虎舍己为人的高贵精神,宣扬报恩的封建思想。
《黄浦江的黎明》	集体所有制星火队	赞扬共产党在黄浦江畔领导人民参加阶级斗争的故事。主题选择良好,但剧情平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的效果。
《母女会》	集体所有制长征队	秦纪文在整风运动后,对剧情先后修改8次。在台上,表演态度端正,做到噱头符合书情,注重突出思想性。

资料来源:百花深处——上海曲艺会演随笔之一[N].文汇报,1959-6-21(3);奇峰突起——上海市曲艺会演随笔之二[N].文汇报,1959-6-24(3);刻画入微·动人可信——上海市曲艺会演随笔之三[N].文汇报,1959-6-29(3);卫明.文苑欣赏:“谁说女儿不刚强”——听评弹开篇《花木兰》[N].新民晚报,1959-6-24(2);丽人.生动的口语形象——听短篇评话《长空怒鹰》[N].解放日报,1959-6-26(6);左弦.弹词《厅堂夺子》的整理[N].解放日报,1959-7-2(5)。

从社会舆论的评价来看,国营的上海评弹团受欢迎程度明显高于集体所有制的评弹演出队,说明组织化的程度高低,与政府机构的关系亲疏,可以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导向。再加上会演前上海评弹团艺人被全体动员以投入创作和排练,成绩斐然自在情理之中。

就上海评弹团节目而言,4个现代题材(《孟师父》《万古长青》《冲山之围》《江南春潮》)和2个传统题材(《厅堂夺子》《老地保》)均为政治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起到表率的作用,这也与该团试验示范的建立初衷、评弹界唯一国营组织的社会地位相一致。开篇与小演唱的展现技巧,可以突出艺人个体的演唱功力,利于流派唱腔的完美塑造,但却只能适合农村的繁冗嘈杂,有损提升集体呈现的视觉效果。这一批评是团长对团内艺人的表述,是自我批评的一种呈现,明确了“唱”是评弹团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仅限于个人而非集体。再加上团长文化局出身的领导光环,更从深层次表明一把手是第一负责人,有资格规划组织发展方向,决定艺人个体和剧团集体的命运。其他集体所有制评弹团,缺乏政府直属的社会地位,没有行政出身的强力领导,难以达到国营剧团的演出水准和取得优异成绩。

三、结 论

1958年的曲艺会演对于演出主题有着明确的比例要求,却因经费需自筹、组织不健全的现状而大

打折扣。这一局面在第二届曲艺会演上得到改观。1959年的曲艺会演,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演出主题反映现代生活的比例要求,达到了所有作品满足“政治第一”的甄选标准。这一切源自于集体所有制评弹队的组建,从而明显地减少了单干艺人的数量,不断地压缩着单干艺人自由发挥的空间,成功地将文艺政策渗透进新编作品,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新观念通过大众娱乐的方式存留于人民脑海中。

政治性是社会主义改造最明显的特征,组织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最有力的保障,将政治印记与艺术作品相融合,从而形成生产建设的合力,实现统一思想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化运动的发生、运作、高潮等系列过程,是在如同上海评弹团一样的集体组织中一步步推行的,并集中表现于两次曲艺会演之中:从节目的推荐到优秀的甄别,从整齐划一的舆论导向到暗流涌动的自我批评,无不体现着集体组织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可见,大型的曲艺会演往往成为基层集体组织的竞技场,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地,成为宏观政策推行的检验区,成为时代特征印记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 [1] 刘厚生.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海市戏曲改革工作报告(1949.5-1950.10)[J].戏曲报,1951,4(1):11-15.
- [2] 王亮.20世纪50年代上海评弹团工资制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6(6):17-29.

- [3] 王亮.建国初期评弹书目的创新研究[J].地方文化研究, 2014(6):59-69.
- [4] 工作总结:春节竞赛动员工作总结[J].戏曲报,1950,1(1):10-12.
- [5] 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计划(修正案)[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8年,档案编号:B172-1-283.
- [6] 全市曲艺会演将举行:重视反映当前斗争生活的题材·节目丰富异常准备演出廿八场[N].新民晚报,1958-05-31(2).
- [7] 曲艺工作总检阅:全市曲艺会演今晚开幕[N].新民晚报,1958-06-10(1).
- [8] 上海评弹团.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纪念刊[A].上海:上海评弹团档案室,1958年,档案编号:第17卷第8件.
- [9] 曲艺会演圆满结束:评选出十八个优秀剧目参加全国会演剧目决定[N].新民晚报,1958-07-16(2).
- [10] 王亮,沈悦.集散之间:20世纪50年代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J].地方文化研究,2015(6):38-49.
- [11] 全市曲艺会演下周举行·曲种有评弹独角戏等近十种·选拔出四十五个节目参加演出.新民晚报[N].1959-06-13(2).
- [12]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举办上海市第二届曲艺会演和上海市1959年杂技、木偶戏会演的计划、批复、总结[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9年,档案编号:B172-1-333.

(责任编辑:王艳娟)